

## 导 论

在百花竞放的文学园地中，小说以它独特的芳香，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虽然它诞生得比诗歌、散文晚，但在我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小说自魏晋志人志怪算起，至少已有 1500 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产生过浩如烟海的作品：就文言小说而言，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收入 2700 种；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白话小说有 1157 部。可见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

导论粗略地介绍三个问题，以期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概况，并对本书的写作意图有所了解。

###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

我国古代小说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文言小说系统，一是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为文言小说的发展初期。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成熟期的到来。宋元为文言小说的转型期，在民间讲唱文学的影响下，文言小说体裁上出现了多元化变化，不仅有了传奇，还有了笔记小说；从语体上，文言小说渐趋通俗化，以通俗的语言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明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小说迎来

了它的繁盛期，在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下，出现了李桢、邵景詹的《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作品。在此基础上，清初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标志着文言小说创作达到顶峰。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话”，说话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说话”人用的底本叫“话本”，经过文人加工、润色过的书面的“话本”，称之为“白话短篇小说”，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元末明初，在“说话”、“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它们成书于元末明初，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宋元时代市民文学的硕果。章回小说的出现，开启了小说发展的新篇章。明代中叶，《西游记》、《金瓶梅》出现，小说由文人与群众相结合转向作家个人创作，作家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得以显现。清初，《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推向顶峰。作家从对封建政治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反思，反映了作家的敏锐感受，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进入晚清，出现了谴责小说，这是古代小说的演进期。伴随着西风东渐，谴责小说在承传古代传统的同时向现代小说迈进，成为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的桥梁。

从上述情况看，如果给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画一个轮廓的话，可作如下描述：文言小说从魏晋时代起，绵延不断，伴随中国古代社会走完它的历程。白话小说起步较晚，但从宋元时代起，就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到五四运动前后，演进为中国现代小说。

小说是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古代它是不受重视的。早在小说萌芽时期的先秦时代，孔子就称之为“小道”，并说：“君子弗为也。”以后又有人称之为“残丛小语”、“稗官野史”等，总之它不能与诗文并列。就是小说家自己，也很难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杆，更不用说正统文人对它的鄙视了。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有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小说的作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

位。一是宋代学者洪迈把小说与律诗并重，称之为“一代之奇”；二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思想家李卓吾以及有见识的文学家冯梦龙、袁宏道、金圣叹等，他们重视小说，甚至把小说凌驾于正统的经史之上；三是清末，近代小说批评家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至此才奠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使小说创作进入更为繁荣的时代。

从“小道”、“稗官野史”，到“文学之最上乘”，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小说自身的发展，小说以自身创作的实绩吸引了群众，受到大家的拥护，因而取得了社会地位。

## 二、学习研究古代小说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学习研究古代小说，必须首先注意作品的时代性，要考察作品的时代背景。因为文学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所以要想“知人”，必先“论世”。

“知人论世”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也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文学研究所做的工作，是要把作品放归回它所处的时代，从中看到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上的进步。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有对同一题材反复创作的现象，也出现过同一题材用不同类型文体反复表现的现象，有的题材由小说传给戏曲，有的是由戏曲传给小说，还有的由诗歌传给小说和戏曲。这样相互影响、不断重复，在古代小说、戏曲中是常见的现象。当然在这些重复的题材中不排除有因袭现象，但在优秀的作品中，绝不是对同一题材的简单重复。由于作者修养、社会地位、时代不同，作品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同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作者对李杨爱情的不同看法在作品中得以体现。白居易歌颂了帝王、妃子的爱情，美化了李隆基抢夺儿子寿王妃子杨玉环的丑行。“杨家

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是说唐明皇从民间选取了杨玉环为妃。而陈鸿《长恨歌传》按照历史真实写：“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其目的是“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丑行进行了揭露，重点是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为什么同一题材而在写作倾向上却有如此大的区别呢？这是由作者的社会地位、身份、修养等决定的。白居易曾为左拾遗，他的“君心民体”观决定了他对“安史之乱”这一历史转折有反思，但不敢去揭露最高统治者的罪行，所以对唐明皇的丑行有所掩饰。同一时期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尚且有这样不同的认识，更何况不同时代的作者！用文学发展的观点看，历史题材在不同时期的运用，都会打上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烙印，反映那个时代的情绪和倾向。因此学习研究古代小说要注意“知人论世”，才能把作品还原到那个时代，从中寻找出时代特点、精神，甚至看到那个时代深层的意识变化，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二）学习古代小说要注意民族的风格和特点，每个民族的作品都与这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形成独特的民族传统风格。

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两种思想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而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它忽视人的个性，强调个人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表现在文学上则强调“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把塑造“仁人志士”的形象作为小说的使命，歌颂那些忠于国家、为民族利益赴汤蹈火、面对邪恶刚正不阿者。即便是那些民间说唱文学，也强调“喻世”、“警世”、“醒世”的教化作用。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作品中出现了“离经叛道”的浪子，走向描写作家人生、心理、抒写个人对社会的切身感受的道路。

中国古代小说历史题材多，与注意编纂历史的传统有关。古

人把修史视为弥足重要的工作，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即便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言情小说，也往往要假托历史。这种观念使小说与历史难舍难分，以至小说牵着史传文学的衣襟走了一段漫长的、艰难的路。研究、学习古代小说要了解这种观念和现象。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殿堂处于中心位置，使后起的文学样式要赢得承认都必须向这个中心靠近。从粗陈梗概的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代表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都重视诗词赋的运用，创造优美意境显示作者的文采。到了宋代，“说话”讲唱文学的兴起，促进了各类小说迅速发展，就长篇章回小说而论，其宏大的结构和叙事方式，无不打上“说话”的影响。《水浒传》中每个英雄人物的出场都相对集中又独立，形成了前七十回链环式的结构，这无疑是受话本小说和史传文学影响的结果，显现出古代小说与说话以及史传文学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言小说语言精练、准确，白话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并且二者之间相互吸收和融合。宋以后，随着民间文学的繁荣，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互学习和结合，民间语言的生动活泼和文人创作的锤炼、润色，使小说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国古代小说从选材到语言都鲜明体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风格和特点。

### 三、本书的写作意图

本书取名《中国小说简史》（古代部分），意在删繁就简，力求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将小说发展过程列为三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一方面从纵的发展方向理清小说发展的源流，以便于对小说的题材、表现方法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小说横的影响，当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

出现时，小说从题材上发生了横向联系。我们将演义和神魔参半的《封神演义》放在《西游记》的续书中，把内容既有“神怪”也有“世情”的《绿野仙踪》放在了《西游记》的续书中，从而看到题材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及前者对后一种类型小说出现的启发。

# 上编 文言小说



## 第一章 唐前小说

### 第一节 古代小说的萌芽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把唐代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把唐传奇的创作称为“始有意为小说”。学术界多沿此论，认为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而把唐代以前的小说创作称为小说的萌芽期和小说的童年时代。

鲁迅先生的话是很有学术见地的。严格的小说的文体概念，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要素：第一，要有相对完整故事情节；第二，要有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三，要有合乎情理的虚构。只有具备这些要素，才能与叙事文学中的其他文体相区别，才可称之为“小说”。我国古代小说，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生、发展，到了唐代才发展为具备上述要素的小说文体，因此唐代为小说的成熟阶段，唐代以前的小说称之为“古小说”。此说至今虽仍有争议，但大致说来已为学术界承认。

古小说的发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历程，一般认为，先秦、两汉为我国小说的萌芽时期，汉末至唐代以前为我国小说的童年时期。

## 一、小说名称的由来和发展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庄子·杂篇·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按照鲁迅先生的意见，这里的“小说”，是琐屑的言词；“饰”是粉饰；“干”是求；“县”同“悬”，高的意思；“令”是美好。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粉饰言词，说一些琐屑的道理，要想求得美名，相去太远了。可见《庄子》中“小说”的含义与今不同，但是粉饰言词、要重视故事已含有小说因素，这是应该肯定的。孔子、荀子都有类似的话。孔子称小说为“小道”（《论语·子张》）；荀子称小说为“小家珍说”（《荀子·正名》），这里的“珍说”即邪质的意思，与正道相对。

汉代，小说的概念有了发展，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远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词。”这里的小说指取日常生活中某些事理作形象化的譬喻，创作短小的故事，大致类于寓言故事之类。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论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里的小说似乎又指民间故事传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写《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的观点，把小说列为一家人，列九流十家之末。虽未入流但已成家，这对小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汉书·艺文志》列小说为十五家（即 15 种），一千三百八十篇作品。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作品，可惜多已亡佚，只《青史子》还残存几条遗文，《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伊尹书》和《宋子》各一卷。其内容看来未免庞杂，如《青史子》的遗文全是讲礼的，很难说是小说。上述的记载已清楚说明，先秦至两汉时期“小说”的含义并不精确，包罗内容比较庞杂。但是小说的因素在发展，萌芽状态的小说也在酝酿之中。

## 二、小说的萌芽

亦即小说探源，或者说形成的诸因素。

第一，小说与神话的关系。神话传说是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人类文学的童年，多表现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我国上古神话，多已散佚，今只散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著作中，但也大多经过后人的润色和加工。

《山海经》为我国古代神话之渊藪，题为夏禹、伯益著作，实为无名氏假托，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秦汉间又有所增益。今传本十三篇，凡三万一千余言。“经”，不是经典的意思，而是经历。此书记载了夏禹治水、伯益经历山川大海的所见所闻、地理博物、奇鸟怪兽、神人异事等，影响较大的故事有“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

《穆天子传》为纪传体裁的神话传说，成书年代不详（大约在战国末年），写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其中有周穆王与西王母的对话。这里的西王母已不是《山海经》中“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模样，而是能吟诗、有感情、含情脉脉的女神。

《淮南子》，西汉刘安主编，二十一卷，内容博杂，其中有神话故事。如“女娲炼石补天”、“羿射十日”等。

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的特点，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神话传说为中国古代小说之渊源。”当然，今天看来，不只这一个渊源，还有其他方面。

第二，小说与寓言的关系。寓言故事是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性的文学样式，其特点是通过假托故事来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由于它有一定形象性、故事性和趣味性，因此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我国先秦时代寓言故事很多，散见于诸子

散文及《战国策》所记载的一些纵横家的言辞中。据统计，仅《孟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五部著作中寓言故事就近千则。人们所熟知的有《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滥竽充数》（《韩非子·内储说上》）、《齐人攫金》（《吕氏春秋·去宥》）、《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等。寓言故事开创了我国古代虚构故事的先河，而又寓讽刺性、幽默性和趣味性，因此它的讽刺艺术特点，对后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直接影响。

第三，小说与先秦两汉散文的关系。先秦两汉的散文从多方面给小说的形成提供了艺术经验，主要是刻画人物、叙述故事以及描写政治和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经验。诸子散文中，如《论语·先进》就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剖析，子路的“率尔而对曰”，表现其性格直爽；冉有自称治理小国“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自信中带有谦虚；曾皙、公西华各有不同的神色和性格，这些刻画人物的经验，不可能不为小说家所吸取。在史传散文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特别是《战国策》、《左传》和《史记》。如：《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赵策》）对鲁仲连不畏强暴的高士风貌的描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对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经历八国，在长期的政治磨炼中，由一个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的贵公子变成一个气度恢弘、胸存大志的政治家的叙述。这些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都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经验。《史记》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不仅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题材，而且在写人、状物、叙事以及在战争场面的描写方面，都为小说的形成和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此外，在“杂史”中，如成书较早的《燕丹子》，记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及袁康的《越绝书》，

记述了伍子胥、范蠡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既有史的性质，又有小说的特点，开历史小说之先河，起着由历史到小说的过渡作用。

第四，小说与宗教迷信的关系。夏、商、周三代宗教盛行，主要表现为相信巫教的活动。巫教信仰的最高神灵是上帝，即“天老爷”，所以“敬天保民”的思想为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不能不影响小说的酝酿和形成。如成书于先秦时期的《汲冢琐语》，记载了很多“卜梦妖怪”和历史传说故事，对小说的形成也有直接作用和影响。明人胡应麟就直接称之为“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少室山房笔丛》）。西汉流行谶纬迷信，阴阳学说兴起，神仙方术兴盛，对志怪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以上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对小说形成有影响的诸因素。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理解，还必须说明如下两点：

第一，上述四个方面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亦即上述诸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组合逐步产生了小说，同时又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形成我国最早的古小说，即魏晋志怪志人小说。

第二，“志人”和“志怪”小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但又各有不同的发展线索。一般说来，神话传说和史传中的神怪部分，是魏晋“志怪”小说的先驱。史传和先秦诸子散文中记事记人的部分，又多方面地影响到魏晋“志人”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

### —— 文言短篇小说的童年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也就是小

说的童年时代。所谓“童年”就是虽已形成，但不成熟，所以鲁迅先生称之为“古小说”。

这一时期的小说产量很大，作家众多，也可分成多种门类，但影响最大的是“志怪”、“志人”两大类。“志怪”小说多记神仙鬼怪之事，但其优秀作品同样反映了人民思想和愿望。从文学渊源的角度考察，这类作品显然系沿着神话传说和史传中志怪部分的轨迹发展而来。这类作品的产生，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盛行有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小说盛行，汉末而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国，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志人”小说主要记述人的琐事轶闻，故又称“轶事”小说或“清言”小说。其文学渊源，则是借鉴寓言故事和史传中记载人物言行片断的手法，可视为史传文学的支流。这类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当时社会上谈玄论道、“清谈”之风盛行有关。当然这种崇尚清谈的社会思潮，又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反映。下边分别谈一下“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情况。

### 一、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很多，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作品尚有三十余种，其中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帝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刘向的《列仙传》，托名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还有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其中《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影响较大，特别是《搜神记》

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 （一）干宝和《搜神记》

《搜神记》，晋干宝撰。《晋书》有传。干宝字会升，晋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人。少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西晋末年召为著作郎，东晋初任史官。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

《搜神记》又称《搜神录》，原书三十卷，宋以后散佚，明人胡应麟搜集佚文，编订为二十卷。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云：皆在“发明神道之不诬”。其内容丰富，佳作颇多，而又文采斐然。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李寄》、《韩凭夫妇》、《干将莫邪》、《董永》、《范式张劭》、《吴王小女》、《东海孝妇》、《牛郎织女》等。下面介绍几篇影响较大的故事。

《李寄》描写少女李寄斩蛇的故事。在“东越闽中”一带的深山里，有条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经常吃人，地方人民为其所苦。李寄是这一地区的贫家女，姊妹六人，以她最幼。为了“得少钱，以供父母”，她自愿意官家的招募，被当作供品送入蛇洞。事前她准备好了香味浓烈的食品和猎犬及利剑。当她被送到大蛇洞口时，蛇闻到食物的香气，先去吃掉食物，她趁机放出猎犬并以利剑杀死了大蛇，然后缓步返回故里。这个故事，歌颂了李寄破除对自然之物的迷信，杀死大虫，为民除害的斗争精神，赞扬了贫家少女机智勇敢，敢于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韩凭夫妇》。韩凭是宋康王舍人，妻子何氏长得很漂亮，被康王霸占，韩凭进行反抗，又被康王囚禁起来，韩凭郁愤而死。何氏得知后，决心以死殉夫，于是“阴腐其衣”，趁与康王一起登楼时坠楼自杀。死后在她的衣袋里发现要求与韩凭合葬的遗言。康王羞恼成怒，故意使她与韩氏的坟墓两冢相望，而中有距离。后来两人的坟头上长起了大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一对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这则故事，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现了下层妇女的高贵品质，同时

又对统治者宋康王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吴王小女》。吴王夫差的小女名玉，与“童子韩重”私订终身，但吴王不从，“玉结气而死”。韩重从齐鲁学习回来，到坟头祭奠她，吴玉把韩重邀进坟墓过起夫妻生活。韩重去时又以明珠相赠，作为纪念。这篇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文笔亦曲折动人。

干宝的《搜神记》记述了各种神仙方士、妖魅鬼怪之事，也记述了奇人异事，许多故事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语言质朴简练而表现力强。《搜神记》对后世文言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直到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还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可见《搜神记》对蒲松龄的影响。

## （二）刘义庆和《幽明录》

《幽明录》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 260 多则。“幽明”之义取《周易·系辞》中“有形无形之象”句，杂记冥冥之中鬼怪神灵变化的奇异之事。与《搜神记》多采用旧籍的情形不同，《幽明录》中的故事大多涉及到作者所生活的晋宋时代，场景和人物描写更为细致，情节的内部因果关系更为明显，语言也更为流畅、雅洁。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卖胡粉女子》、《庞阿》、《新鬼觅食》、《刘晨阮肇》。

《卖胡粉女子》描写某男爱上了卖胡粉的女子，因“无由自达”，乃托买粉以接近女子，那女子知道真情后为之感动，于是相约幽会，但乐极生悲，幽会之际“欢跃遂死”。其父母发现胡粉而怀疑卖粉女子为凶手，在县衙公堂上，女子乞求与男子相见，“乞以临尸尽哀”，经往抚之恸哭，男子复生，真相大白，遂为夫妇。这是为真情而起死回生的恋爱故事，塑造了一个痴情男子的形象。

《庞阿》，写石氏女爱慕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成为唐人传奇《离魂记》

的蓝本，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阿绣》就受到本篇影响。《庞阿》成为小说戏剧离魂故事的滥觞。

《新鬼觅食》叙述的是一新鬼先后前往三个人家觅食的故事。前两家“奉佛事道，情难自动”，新鬼一无所获。后至百姓家作怪，家人大惊，以食祀之。表现了佛教和道教对于世俗中人的意义，主要是提供心灵上的安全感。为了体现这一意义，作品一方面讽刺了人世间常见的一种不良现象，新鬼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帮人干活直到筋疲力尽，却得不到一点报酬，后到普通百姓家兴妖作怪却得到丰美酒饭，这无疑是对社会上欺软怕硬一类人的揶揄。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故事宣扬了宗教思想，意在劝导人信奉佛道。可见此时宗教思想深入人心。

《刘晨阮肇》叙述了刘阮入仙台的故事。作品写刘阮二人迷路，见山间小溪“有胡麻饭糝”，逆流而上二三里，见仙女、群女来贺婚以及刘阮离开时欢送的场面，洋溢着生活气息。对仙境描写，无论住室饮食，都贴近现实生活。刘阮在此停留半年，人间已过七世，可见仙界是超越时间和生命局限的理想世界，而人间生命则极为短暂。两个世界的对比体现出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仙界的欢乐幸福，正体现乱世中人们对生活的渴望。刘阮与仙女的美好婚姻正表现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美好婚姻的追求，结尾写刘阮离开仙境回到人间，表现对现实生活追求的执著，但后又飘然而去，“不知何所”，给人们留下了想象余地。此篇与《搜神后记》中的《剡县赤城》都属于“洞仙”故事，而《刘晨阮肇》写得更世俗化，意境更优美，人物形象较丰满，故事情节也更曲折生动。

志怪小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作品还很多，如《干将莫邪》（《搜神记》）、《宋定伯》（《列异传》）、《白水素女》（《搜神后记》）、《阳羨书生》（《续齐谐记》）等。当然，志怪小说中也有很多宣扬封建迷信的作品，这是必须看到的。